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中国文学史

(2)

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郑训佐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從讀者者三四年其昆弟性
其全固知其有成立也前年什
家時天寒大雪觀雪於池閣上
作竹樹時以凍不可去年春館
遂將此留蘇舍凡閱兩寒暑而後
有未盡善然而坡陀之間林疎之
易者伯時用心而勞矣伯時心好畫
為之而不辭至九年四月廿日吳郡
題于吳氏舍館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中国文学史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郑训佐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编 秦汉文学	(1)
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和中期的文学	(1)
第一节 历史的悖论	(2)
第二节 政治杠杆上的缪斯	(3)
第三节 少年天才的忧患	(6)
第四节 现实感召与内在欲求的重叠	(9)
第五节 大赋之先声	(11)
第六节 御用文人的哀乐	(13)
第七节 其他	(17)
第二章 司马迁和《史记》	(23)
第一节 蚌病成珠	(23)
第二节 面对历史的沉思	(27)
第三节 无韵之《离骚》	(32)
第四节 跨越时空	(37)
第三章 汉乐府民歌	(39)
第一节 乐府概念的演变及分类	(39)
第二节 悲哀与怨愤	(41)
第三节 艺术的进步	(50)
第四节 历史效应	(53)
第四章 西汉后期及东汉前期的文学	(55)
第一节 哲理与文学的联袂	(56)

第二节	从文史合一到文史分离	(59)
第三节	理性精神的崛起	(63)
第四节	其 他	(66)
第五章	东汉中期至后期的文学	(69)
第一节	诗赋的多面手	(70)
第二节	末世之音	(74)
第三节	赵壹及其他	(76)
第四节	从单一到丰富	(78)
第六章	诗域的拓展	(83)
第一节	历史的轨迹	(83)
第二节	辉煌与惨淡	(89)
第三节	七言的仪态初露	(94)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97)
第一章	建安文学	(97)
第一节	慷慨与悲凉	(100)
第二节	文学理性的探求者	(104)
第三节	建安之杰	(107)
第四节	殊途同归	(114)
第二章	魏末和晋代诗文	(119)
第一节	历史的呼应	(120)
第二节	道似无情却有情	(124)
第三节	强弩之末	(131)
第四节	太康之英	(135)
第五节	千古伤心属哀情	(140)
第六节	左思风力	(143)
第七节	英雄失路和列仙之趣	(148)

第三章 陶渊明	(154)
第一节 家世、生平与人格	(154)
第二节 田园与人生	(156)
第三节 独立苍茫	(165)
第四节 真率的散文世界	(170)
第五节 偶像的力量	(173)
第四章 南朝文学	(175)
第一节 逍遥山水	(178)
第二节 发唱惊挺与铺锦列绣	(185)
第三节 模拟与综合	(192)
第四节 追求新变	(197)
第五节 新体诗的中坚	(200)
第六节 继承中的突破	(211)
第五章 北朝文学	(219)
第一节 北地三才	(220)
第二节 散文的辉煌	(223)
第三节 从靡丽到苍凉	(232)
第六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240)
第一节 柔情绰态的儿女歌	(240)
第二节 音调高亢的雄浑曲	(247)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256)
第一节 神怪世界	(257)
第二节 人生众相	(265)
第八章 《文心雕龙》与《诗品》	(272)
第一节 《文心雕龙》	(272)
第二节 《诗品》	(279)

第一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和中期的文学

在中国悠远的历史时空，秦王朝无疑是一颗流星，在倏忽间闪烁，又在倏忽间熄灭，这使它还不可能把带有非功利色彩的文学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何况强悍的性格又使它对之怀有一种先天性的冷漠。因此，与政治上的大手笔相比，秦代的文苑却一片荒芜。经过数年的楚汉之争，亭长出身的刘邦成了中原大地的主宰，这个同样对文人持有偏见的草莽英雄，后来在谋士的说服下，渐渐意识到文人所具备的而斩将刈旗的军人又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于是叔孙通、陆贾等人走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但汉初（汉高祖至汉景帝）毕竟是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恢复民生，为了给统治者提供策略上的参照，政论成了最普遍的写作形式。与此同时，随着楚人政治上的胜利，楚声短歌也以激越苍凉的音调弥漫于文坛，就连粗疏少文的项羽、刘邦也有著名的《垓下歌》、《大风歌》传世。辞赋作为传统的文学形式，一方面踵继楚骚的步武，另一方面又在悄悄地别开生面，大赋的身影已隐约可见。到了中期（汉武帝到汉宣帝），由于前期的铺垫，武帝时代政治上如日中天，威加海内，文学也似杂花生树，夺人眼目。与大一统局面相配合的大赋，唤起了文人空前的创作欲，在长篇巨制的形式中，透露出虽然过分膨胀但却不乏真诚的政治热情。当然，散文的辉煌丝毫不亚于大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异军突起的重镇，它所掀起的史传

文学的旋风,使历史失去了平静。不容否认,大一统的巨大的压力,也使文人们体会到了个体被逐渐淹没的悲哀。许多御用文人,一方面为情势所迫不得不身处锦绣牢笼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无悲凉地憧憬已经远逝的自我世界。当气度恢弘的武帝离去,汉王朝便如元气已丧的巨人,昂扬的头颅渐渐低垂下来,文人们除了要忍受专制的重负,还要面对诸多的社会磨难,他们的步履也就更加沉重。

第一节 历史的悖论

公元前 221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年份之一,因为就在这一年,秦灭掉了最后一个与之相对抗的势力——齐国,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中原逐鹿的刀光剑影终于成为固定的画面被定格在历史背景之上,尽管这个定格所带来的宁静仅仅持续了十五年。

和所有处在初创时期的王朝一样,秦代所采取的文化措施是围绕如何巩固统一的封建拟制政权而进行的,这就是著名的琅邪石刻上所说的:“端平法度……器械一量,书同文字”。这给日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事业的进展带来了很多恩惠,但所有这些,对文化事业而言,只是一种前期性的工作,并且这一切都是在强硬的专制手段下操作的,因此,在残酷的政治硬件以威风凛凛的姿态颐指气使的同时,本来呈多元之势的文化走向也戛然而止。公元前 213 年,首都咸阳终于燃起了令历史叹息了两千余年的焚书的烈火。在这场大火中,除了自然科学和神学著作,其他收藏于民间的经典都化为灰烬。第二年,460 余名儒生被活埋,专制主义对文化本身的摧残终于发展到使人发怵的顶峰。这就是令谈者色变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发生,固然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因

素亦不可排除。秦的本土处于中国的西陲,自古为戎狄杂居之地,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种族因素,形成了同样独特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体现了原始的狂飚突起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诗经·秦风》中一些作品粗犷雄悍的风格是最好的印证——这种特性,使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政治军事的翅膀固然可以强大到征服所有的手,但文化的羽翼却柔弱得难以升腾。从先秦的情形看,其他国家都产生过光华夺目的文化巨子,如鲁有孔子、孟子、墨子,楚有老子、屈原,宋有庄子、惠施,赵有荀子、公孙龙,齐有邹衍之徒,韩有韩非,魏有杨年,唯独秦国的史册上一片萧瑟。这样,当因现实需要进行变法,而又必须借重知识和智慧的襄助时,便只好依靠外来的“客卿”。在这种情境下,士阶层只是以政治婢女的身份发挥有限的历史功能,而那些无法直接与政治联姻的文人,便被无奈地冷落在现实的边缘,商鞅变法时,便规定文学之士不得进入秦国。从历史效应看,由非理性和功利主义熔铸而成的利剑,的确曾使它的操纵者所向披靡,成为大一统的骄子,但也的确造成了文化土壤的贫瘠并种下了丛丛荆棘,使政治的辉煌与文化的黯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尤其是秦王朝建立后,专制的阴影进一步向文化的深层浸透,灰暗的云层下,文化那羸弱的身躯更加佝偻。

秦王朝命定地陷入了自身的历史悖论之中。

第二节 政治杠杆上的缪斯

从严格意义上说,在秦王朝短暂的十五年的历史中,没有产生过一位可以进入中国文学辉煌的历史序列的作家,也没有产生过一部有着重大历史回响的著作,因为我们下面提到的李斯其主要文学活动发生在先秦,而《吕氏春秋》一书也是成书于先秦,之所以把他们放在这里论述,一是因为他们与这一段历史仍有关联,二是

慰情聊胜于无。

李斯(?—前208)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经随荀卿学习“南面之术”,因看透楚工不足以成大事,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后拜为客卿,成为秦统治集团的主要决策者。这个天资卓越的人,终其一生把自己捆绑在政治的马车上,因此,当车折轮摧,他的仕途和肉体生命便一同完结。他现存的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是《谏逐客书》。这篇写于始皇十年(前237)的政治性散文,针对秦王决意驱逐客卿的想法,通过历史事实提出“客卿何负于秦”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引类作比,揭示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致秦王看了,不能不悄然动容,解除了逐客之令。文章中说道:

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而制诸侯之术也。

此中大有纵横家舌卷风雷的气势,起承转合之间流动着荡气回肠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秦王的政治天平在倾斜的一刹那,复归于平衡。

李斯入狱后,有《狱中上疏》,名为自讼,实以反语邀功,因身处囹圄,斧钺相加,故没有了骋辞铺采的闲情,而是奋笔直陈,斩钉截铁,与《谏逐客书》相比,别是一番风光: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才,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

秦之强：罪二矣。……

功高遭戮，免死犬烹，虽不睹老泪纵横，其悲凉的心境却难以掩抑。

与李期打比，赵国人吕不韦（？—前 235）的城府显得更深。他赁藉自己雄厚的资财，帮助秦始皇之父庄襄王登位，从此仕途隆达，位居相国。与纯粹的政治家不同，吕不韦在一只脚踏进政治漩涡的同时，另一只脚又伸向了文化领域。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组织门客编纂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此书编纂的初衷固然有与战国四公子在网罗人材方面互相抗衡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却开创了中国学术史的新局面——杂学著作的诞生，这使他在无意之间比单纯从政治需要“养士”的四公子高出一筹。《吕氏春秋》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 160 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在书中都有所反映，但以儒道的线索最为明显。全书长于说理，但同时引入遗闻寓言，故文学性较强，如《察今》中的一段：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堕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坠”。舟止，从其所契者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

这就是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寓真实于荒诞之中，寄冷峻于幽默之内，使人回味无穷。

秦代还有一些石刻文字，如泰山、会稽、琅琊等地的石刻。其文大都出于李斯之手，内容不外乎歌颂皇恩，形式上则规模雅、颂，艺术上乏善可陈，只是专制政权典雅的点缀。

由此可见，在秦代，文艺女神还潜藏在历史帷幕的背后，而且，她此时的惟一功能是跪伏在政治冷峻的雕像面前，献上自己的一份虔诚。只有在以后的岁月中，她才有机会走到历史的前台，并调整自己的姿态，逐渐传达出铿锵的足音。

第三节 少年天才的忧患

唐代的李商隐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诗中惋惜的“贾生”就是汉初的少年天才贾谊（前 201—前 169）。这位一直拨动着历史琴弦的人物，18 岁即以“诵诗属书”闻名乡里，继而被举荐到朝廷担任博士（王朝的咨询官）随后以“专擅之罪”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五年后被召回，任梁怀王太傅，后因梁王坠马而亡，贾谊便以 33 岁的英年在忧郁中死去。在中国古代作家群体中，贾谊的生命虽然显得太短促，但汉初还比较寂寞的文坛却因他的光华而平添了几分精采。这一方面得力于他激越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得力于这种热情冷却后沉重的生之忧患。

汉初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是相当深重的，但这也是风云际会的绝佳时期。如何使刚刚从战争的烟尘中走出的王朝顺利地通过“瓶颈”时期，参与意识十分强烈的士阶层就此展开了思考，这其中包括中央集权与地方诸王侯的矛盾，农与商的矛盾，朝廷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贾谊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兴奋、忧虑、批评、谋划不由得纷至沓来，这无一——地体现在《过秦论》、《论治安策》等脍炙人口的篇章中。

《过秦论》的写作宗旨，是试图通过对秦王朝兴亡原因的探讨，给汉初的统治者提供一面镜子，其中对秦国崛起过程的描述尤为夺人魂魄，但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折入对陈涉起义的渲染，虽同样扣人心弦，但情味迥然不同，强烈的对照中显露出历史的严酷，从而揭示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主题。文章雄辩滔滔，如急湍奔突，豪迈中恣肆着诗人般的激情，这使贾谊能够摆脱一般政治家过于理智的弱点，以横绝一切的气势面对外部世界。此类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的杰作使贾谊短暂的一生风采毕现。

在西汉前期的赋坛上，贾谊也是不容忽略的一位大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影响，他的辞赋具有了上承楚骚的传统、下开汉赋的风气的功能。与散文主要用来阐发政治见解、抒发时代激情不同，辞赋则是他咀嚼人生苦涩的一种方式。有人说智者往往是最敏感的，天才常常是最抑郁的，当苦难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便成了人生最深刻的体验者。贾谊遭贬后，便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他途经汨罗，想到自己与屈原极相似的身世，仿佛听到了两颗心灵无声的碰撞，感慨之下，写下了震撼千古的《吊屈原赋》，他诅咒人间的险恶，同情这种险恶给屈原造成的人生坎坷。甚至提出了“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责难，从而闪烁出生命最后的亮色：

国其莫我知兮，独抑郁其谁语。

风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

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

徊蜩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

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遗憾的是，当贾谊身处长沙的萧斋、面对猫头鹰吉凶未卜的“闲暇”之态，这种亮色却化为虚无，在《鹏鸟赋》中，道家消极的人生观强烈地侵蚀着他，使他由一个入世者成了彻底的厌世者，生命的温度降到冰点。生死一体，祸福并论，吉凶同域，人世间的一切都处在模糊的状态，人生的意义也因此消解。这种价值取向当然是消极的，但却从生存的悲凉层面，显示了人生的飘忽性、悲剧姓，不管你是否愿意，它都将成为中国文学日益醒目的主题，而贾谊正是这主题较早的关注者。

在贾谊死后，晁错（前 200—前 154）成了政论界最耀眼的明

星。这位有“智囊”之称的政治家有着与这一称号相符的杰出才能。与贾谊相比,他似乎更理性,往往能够克服一般书生意气用事的弱点,直陈其事,切中时弊。他现存的8篇疏策,都是针对当时最尖锐的问题而写作的,如《论贵粟疏》探讨的就是如何重农抑商;《言兵事疏》申述的是如何制服匈奴。也许是天性质实并太强调功利,他的文笔不像贾谊那样灵动飞跃,而是如老吏判狱,深刻而沉稳。但这种深稳在封建帝王的棋局中,充其量只是一枚随时可以搬弄的棋子,他最终还是成了政治的殉葬品。

汉初还有几位政论家值得一提。首先是陆贾。他是一位以口辩著称的策士,曾向粗疏少文的刘邦说明“居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并因此受到信任,撰《新语》12篇。此书已佚,现存者真伪难辨。其内容大概不外乎兴败存亡之道,风格上仍保存战国策士的遗韵。贾山稍后于陆贾,其文最著者当推《至言》,它在立意上与贾谊的《过秦论》近似,“言治乱之道,俗秦为喻”。令人感动的是文章表现了对原始民主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武士精神的羡慕,正因为如此,才能笔挟风雷,器宇轩昂,这种发自历史深处的声音,在“道”与“势”的关系已产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显得弥足珍贵了,难怪徐中行说它:“西汉当推独步”(《汉书评注》卷51引)。邹阳(?—前120)也是受纵横家影响的人物,他留游于吴王刘濞门下,和枚乘一同作书对吴王的反叛之心进行规劝,因吴王不从,便到了梁孝王刘武的门下。但梁王同样有不臣之心,邹阳又进行一番劝谏,结果梁王听信谗言,将之下狱,于是便有了动人肺腑的《狱中上梁王书》。文章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拉开了令人颤栗的千古黑幕——“忠面见诛”,然后又以诚实的情肠反复申述“知人”与“不知人”的不同结果。转承之间,一波三折,使人情为之惻惻,思因之绵绵,梁王览之,亦翻然悔悟,放之出狱。文章中用典其多,铺采骋文,气息已与赋体相通。

不管是贾谊,还是晁错等人,他们的文章都表现了浓厚的实用

主义色彩,从而使得这些作品多少体现了“亚文学”的特征,即美学效应仍然是通过政治的隧道传达给人们的。但与秦代文学的奴婢化不同,由于汉初现实环境的相对宽松,他们对世界的观照基本上能够处于自由回旋的状态,甚至在精神上直承战国策士的雄风,洪钟大吕,其响激越。所以,虽然纯文学的根苗刚刚破土而出,但人格的丰碑却已巍然矗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因美学风范不足而造成的缺憾。

第四节 现实感召与内在欲求的重叠

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尤其是在文化的混沌期,文学体现的价值首先是伦理效应和政治效应,即使在以后文学渐趋独立的岁月中,它与伦理政治的联系也没有因此完全断绝。如果我们稍作巡视,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对比较受到官方关注甚至提倡的文体,如《诗经》中的“雅”、“颂”,六朝的骈文,唐代的律诗……。对汉代而言,辞赋则是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质的文体。仅《汉书·艺文志》就录有西汉时期的辞赋 900 余篇,作者 60 余人,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赋坛“作者鼎沸”的热闹景象。许多文人几乎倾其终生的心力,建构他们的这一精神殿宇,以此邀宠于君王,以此“润色鸿业”,从而使辞赋这一文体具有了明显的御用性质。这种御用性固然与王朝的主动姿态相关,但士人由外在的感召而形成的内在欲求,也是使这种御用性强化的重要因素。

虽然辞赋的繁荣肇始于汉初,但却鼎盛于武帝时期。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经过文、景二帝的励精图治,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经奠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虽然司马迁因情绪的激动对事实

难免夸张,但基本符合历史的实情。有了这样雄厚的背景,气度恢弘的武帝便改变了祖先稳健的作风,开始了横越四海的伟业,在北方击退了为患多年的匈奴,在东南则平定了朝鲜和南越,辽阔的疆域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拓宽了心胸,于是中华民族第一次自信地把目光有意地投向了更远的外部世界,张骞出使西域便肩负了这个使命,中西文化的人碰撞、人融和由此拉开了序幕。于是内呈祥和,外示雄强,一片升平景象。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盛世,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士人,怎能不承受这辉煌的感召,怎能不因此产生颂扬的欲求?我们现在于汉大赋中所体味到的那无比的自信与自傲,那牢笼宇宙、覆盖万有的豪情,那开放的而不是局促的视角,是否可以看作这种感召与欲求的折光?

与此同时,思想意识的底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为了使民众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休养生息,汉初崇尚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提倡简约,在这种情况下,铺陈扬厉、逸放宏丽的大赋是不会受到垂青的。即将出场的绝世才子司马相如在景帝的班行中就是一个聊以充数的角色,因此大有明珠暗投的凄凉。但到了武帝时代,汉王朝仿佛已由布衣裙钗的俭妇变成了翩翩佳公子,富贵气不觉袭人而来。此时它主观上需要的不是如何韬晦,如何待机而动,而是如何消受目前的繁华。因此它期待寻求到能服务于这一宗旨的手段,于是,抱朴守真的道家退出历史舞台,追求功利的儒家粉墨登场。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就是由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措施的出台。与其他各家相比,儒家似乎天生就是为封建专制政权而生存的,它强调君臣秩序、伦理关系,强调个体如何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总体格局。所以,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曾遭到冷落,但最终却命定地成为封建时代生命力最长久的官方意识。儒家十分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这就是所谓的“美刺”,汉赋中流露的参与性——包括颂德与讽喻——就是这种功能隐约的体现。

当然,历史的影响也在意料之中,其中以楚骚最为显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宗教式的迷狂、诗性的想象、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不懈的灵魂漫游,所有这些构成了原始浪漫主义的特征。到了汉代,由于历史结构产生了变化,楚骚精神的一些因素沉落到了历史的底层,但某些特质却超越了时空,继续沾溉后人,如它的博丽,它的渊深,这些因素与中原古典主义的厚重相融和,便形式了新的美学形态——“宏丽”,而这正是汉大赋最引人注目的美学风范。又因为辞赋是当时士阶层安身立命的凭藉,他们不但用它谋求稻粱,还以之在强烈的政治竞争中显示才华,突出自我形象,因此必须具备戏剧性的效应和征服的力度,而这方面,纵横家自然是最好的参照,这与汉初的政论一脉相通。汉大赋中问答式的辩难形式,以及由此渲染的凌厉的气势,东西南北、山川湖海、草木虫鱼、日月星辰包容殆尽的广阔的视角,便显示了“纵横”之势。

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激发,注定汉大赋会挟带时代的风云纷至沓来。

第五节 大赋之先声

最早使大赋以比较成熟的面貌展示魅力的是枚乘(? - 前184),他字叔,淮阴(今江苏清江市)人。文帝时曾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纠集七国诸侯发动叛乱,枚乘曾上书劝谏,但遭到拒绝。七国叛乱平息后,朝廷召其为弘农都尉,他却托病辞官,到梁孝王那里做了门客。武帝即位后,仰慕枚乘的文名,以“安车蒲轮”的殊遇征召,他命驾前往,但因年事已高,死于途中。由这简单的经历可知,他是一位没有大起大落、生乎相对比较寻常的文人,但与这种寻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当时的辞赋界却是煌煌重镇,其代表作《七发》历来被看作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一座丰碑。

《七发》的线索并不复杂。“楚太子”身体不适,“吴客”前去探

望,认为这是生活过分逸乐的恶果,为了改变太子的作风,吴客试图用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畋猎、观涛等六钟乐趣激发他,但都未能奏效。最后以“要言妙道”启示,便“潏然汗出,霍然病已”。对于此篇宗旨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刘勰认为这是告诫膏粱子弟不可纵欲(《文心雕龙·杂文》);李善认为是劝谏梁王的不臣之心(《文选注》);还有人以为是针对吴王的反叛行为而作。如果不牵强附会,根据文本理解,刘勰的说法比较合情合理。

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七发》虽然没有赋的名称,却有赋的本质。它在结构上采用了典型的问答式的组织方式,并波澜起伏地展开描述,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其中的七个事体又能各自独立,它们串连在一起,加之以“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的层层推进,便卓然成为鸿篇巨制。在句式上或三言或四言,联袂而至,如急风骤雨;在修辞上则多用转折连词,婉曲地拓展思绪,这与楚辞相比都是崭新的质素,又是为后来的大赋作家所仿效的。有些片段尤为精采,如“观涛”一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澄澄,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然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颢颢印印,据据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

非诗非文,亦诗亦文,遗情想象,万象俱奔,的确为赋中经典。

《七发》对后世辞赋创作的规定性也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七”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唐以前模仿者就有 40 家,如曹植的《七言》、张协的《七命》等。难怪《文选》于各类辞赋外,另立了“七”这一类。